

王陽明的教育思想

吳 蘭

一、緒言

中國自古有一套很完整的教育倫理哲學，和很深奧的政治哲學，大學中庸之道，就是教育倫理和政治的哲學，其主張為政以德。可惜這一大道，到了漢儒而支離，到了宋儒而空虛，直到明代大儒王陽明，方始大放光彩。

陽明是宋明以來最大的理學者和教育者，明儒學案姚江學案曰：

「有明學術，白沙開其端，至姚江始大明。蓋從前習熟先儒之成說，未嘗反身理會，推見至隱，所謂此亦一述朱耳，彼亦一述朱耳。高忠憲云：『薛文清、呂涇野語錄中，皆無甚透悟。』亦爲是也。自姚江指點出良知，人人現在，一反觀而自得，便人人有個作聖之路。故無姚江，則古來之學脈絕矣。」

因著人人有個作聖人之路，是以陽明在其主張人皆可以爲堯舜之下，他的教育對象乃能普及到社會的各個階層；又因爲人的資稟各異，人各隨其分限，皆有可至之境，所以主張因材施教以變化氣質。

「聖人教人，不是個束縛他通做一般。」（傳習錄下）

從現代的眼光來看，此即是教育的原理和方法。概講學固應注重目的，尤應講求方法，有諸內必形諸外，外又必反應乎內。故陽明曰：

「夫理無內外，性無內外，故學無內外。講習討論，未嘗非內也；反觀內省，未嘗遺外也。」（傳習錄中）



因之陽明講學，是針對聖人境界而求一體驗上鑑定的根據；它的重點即是在生活的體驗上，是內外並重，本末兼該，而非只是在思想的系統上。

陽明所宗之「心學」，在宋時流傳不廣。僅管象山高唱：「此心同，此理同。」，可是當代和他同心、同理者，却是寥寥無幾，蓋自南宋以至明初，所講理學諸儒，皆宗朱子，一脈相傳，聲勢浩大，明初政府且將理學定為官學，以程朱思想為主，作為取士標準。陸象山一派，其「心學」乃雖和程派思想略有呼應，但其間並無師承，且是靠他一人孤軍奮戰，在聲勢上，當然不及程朱。及陳白沙出，「心學」一派乃又呈復興跡象，而直到象山死後三百多年，才有另一位哲人出來，與象山共鳴，那就是有明一代的心學大師姚江王陽明。

陽明認為朱子的學說，雖是集北宋理學的大成，發明六經論孟的要旨，對文化的貢獻很大，可是象山辨明義利，直探本源，對於性靈的提撕，也功不可泯，豈能爲了附和朱子而誣象山爲禪學，使象山蒙不白之冤？所以他激烈的說：

「我願冒全天下的指責，而爲象山進一言，即使因此得罪了別人，也絕不後悔。」（陽明作象山全集敘）

陽明這段慷慨的言詞，並非意氣用事，而是爲了薄救學術風氣，不得不辨個是非曲直。同時陽明深感到宋代之所以偏安江南，之所以積弱不振，以至於滅亡，就是因爲人心浮薄，士氣低落，而這一切都是由於學術不明，所以他要挺身而出，接過象山「心學」的旗幟，願以「道濟天下之溺」。（摘自張起鈞吳怡著中國哲學史話）

根據陽明此一教育思想的見解，探索陽明思想體系的本源，約略可歸納爲下列三點：

一、良知論

孔子爲萬世師表，以六藝爲教，蓋欲使從學之三千弟子，皆有所裁成。然及門弟子，或僅具聖人之一體，各隨其性之所偏；而成就異趨，有注重外在典章文物者，如子夏，子張者流；有注重內在身心修養，如曾子是也。其後人心益靡，世道愈下，陽明因論朱子「格物致知」、「讀書窮理」之弊，而遙接象山直指本心之學，困心衡慮，以創此「致良知」學說。

良知一辭，源出孟子「人之所不學而能者，其良能也。所不慮而知者，其良知也。」此良知學爲陽明學說的重要基礎。然則，「良知」一辭，究屬何義？



「良知者，孟子所謂是非之心，人皆有之者也。」（傳習錄上）

「良知只是個是非之心，是非只是個好惡，只好惡，就盡了是非，就盡了萬事萬變。」（同上）

「良知只是一個天理自然明覺發見處，只是一個真誠惻坦，便是他本體。」（全二）

「夫良知即是道，良知之在人心，不但聖賢，雖常人亦無不如此。若無有物欲牽蔽，但循著良知發用流行將去，即無不是道。」（全二）

照陽明這些話看來，又可見知陽明的所謂天理，只在人心的好惡上，一切天理都是善，也都只是在人心上，只爲了人心自能分別善惡，也只有人心始能分別善惡，故說：「天理在人心。」而人心之本體，亦本無善無惡，只是人心有一段昭明靈覺處，它就能知道事事物物的一種善惡分別，也就是知道天理。因此：

「所謂學者，正惟致其良知，精察此心之天理。」（全二）

「聖人之學，惟是致此良知而已！」（全三則錄書魏師孟卷）

學爲聖人，亦只有「致良知」而已矣，是以，拂除心中的私念，以保存那個本性的善端，在事上磨鍊，致我的良知於事事物物上，使事事物物都有其理，這就是陽明的「致良知」陽明教育思想的中心觀念，在指出良心知爲心之本體，其治學方法亦循此義而發揮文論。

二、知行合一論

我國哲學史上，討論知行二字者頗多，中庸主張「先知後行」，尚書主張「知易行難」。其實，把知行分爲兩件事，而且認定知在先，行在後，這是世人最易生的錯誤。陽明由其格物致知之說，論及知行問題，他說：

「知之真切篤實處即是行，行之明覺精察處即是知，知行工夫本不可離。只爲後世學者分作兩截用功，失却知行本體，故有合一並進之說，真知即所以爲行，不行不足謂之知。」（答顧東橋書）

又曰：

「行之明覺精察處便是知，知之真切篤實處便是行，若行而不能精察明覺，便是冥行，便是學而不思則罔，所以必須說個



知，知而不能真切篤實，便是妄想，便是思而不學則殆。所以必須說個行，原來只是一個工夫，古人說知行皆是就一個工夫上補偏救弊說，不似今人分作兩件事做。」（答友人問）

知行既合而一，故只說個知時，便有行在，只說個行時，便有知在，就如某人知孝，某人知弟，必是其人已會行孝行弟，才可說他知孝知弟，此便是知行的應用。聖人教人必是如此，方可謂知，不然只是不會知。

而後世學者儘有將知與行分做兩截。門人徐愛嘗請門陽明：

「如今人儘有知父當孝，兄當弟者，却不能孝，不能弟，便是知與行分明是兩件。」（傳習錄上）

陽明謂這只是被私欲隔斷，不是知行的本體，要慎復那知行的本體，就得要除去那些私欲不可。陽明曰：

「今人只因知行分作兩件，故有一念發動，雖是不善，然却未曾行，便不去禁止。我今說個知行合一，正要人曉得一念發動處便是行了。……須要澈底不使那一念潛伏在胸中，皆是我立言宗旨。」（傳習錄黃直記）

此即所謂「爲學須在心髓入微處著力」，隨時「去人欲，存天理」，意念一萌，便即刻徹底鏟除，不使一絲不善潛伏心中，這就是陽明知行合一之教。

三人皆可以爲聖人論

陽明聖人人格在外王特徵上的表現，由於他的教學上的成就就能恩澤並感化很多人可知。蓋其良知學之最高理想，就是人皆可以爲堯舜。王畿曾作評語說：

「夫儒者之學，務於經世，但慮於不得其要耳。昔人謂以至道治身，以土苴治天下，是猶泥於內外精粗之二見也。動而天游，握其機以達中和之化，非有二也。……莫非良知之妙用，所謂渾然一體者也。……」（王畿全集，卷二十六）

在教學方面，此「動而天游，握其機以達中和之化」，可謂聖人之教化也。

錢德洪記陽明教學之特殊感化人之處，曰：

「……故吾師終日言是，而不憚其煩，學者終日聽是，而不厭其數，蓋指示專一，則體悟日精，幾迎於言前，神發於言外，感遇之誠也。」（傳習錄下）



這種教化，莫怪乎他赴思田時，沿途受人熱烈歡迎了。

至於陽明謂人皆可以爲聖人，他又如何解釋聖人呢？

「聖人之所以爲聖，只要其心純乎天理，而無人欲之雜。」（同上）

「聖人之心如明鏡，只是一個明，則隨感而應，無物不照。未有已往之形尚在，未照之形先見者。」（同上）

「聖人本體明白，故事事知個天理所在，便去盡個天理。」（同上）

回復到良知的本體，就是聖人。所以只要去掉良知上的障礙，使心得到如明鏡的境界，則聖人可爲也。因此陽明在答顧東橋書中末一段所謂拔本塞源之論，所要拔去的，所要塞去的，便是功利觀念，以直躋聖人之教化。

「其教之大端，則堯舜禹之相授受，所謂『道心惟微，惟精惟一，允執厥中。』而其節目，則舜之命契，所謂『父子有親，君臣有義，夫婦有別，長幼有序，朋友有義。』五者而已。唐虞三代之世，教者惟以此爲教，而學者惟以此爲學。……

此聖人之學，所以至易至簡，易從易學，易能而易成才者，正以大端惟在復心體之同然，而知識技能非所與論也。」（答顧東橋書）。

這是陽明答顧東橋書的末一節，所論者是從人類的心性上出發，從教育上著手，依此循序漸進，則人莫有不成爲聖人。

貳、陽明的生平及其學說的關係

浙江餘姚王文成公，名守仁，字伯安，其先出晉右軍將軍羲之後。父華，字德輝，別號貫庵，又稱龍山公。少年嘗築室於浙江四明山的陽明洞（在今浙江省紹興縣東南二十里會稽山上），自號陽明子，故學者稱爲陽明先生，官至南京兵部尚書，封新建伯。生於明憲宗成化八年（西元一四七二年），離陸象山之死已有二九七年，卒於世宗嘉靖七年（西元一五二九年）十一月廿九日，享年五十七歲，諡號文成，萬曆中，從祀孔子廟庭。

陽明的誕生，有一段類似神話的傳說，明儒學案載：

「先生娠十四月而生，祖母岑夫人夢見神人送兒自雲中至，因命名爲雲，五歲不能言，有異僧過之曰：『可惜道破！』始改今名。」



幼時穎敏善記，氣宇非凡，五歲以後，便逐漸蘄露出他特異的稟賦。王文成公年譜亦載：

「五歲……能言。一日誦竹軒公所嘗讀過書，訝問之，曰：『聞祖讀時已默記矣。』其強記有如此者。」

十歲以前，陽明都生活在家鄉餘姚，十一歲因父親龍山公迎養竹軒翁，乃跟隨祖父同行往京師（今北平），路過金山寺，竹軒翁與客人飲酒賦詩，正沈吟間，陽明即從旁賦曰：

金山一點大如拳，打破維陽水底天；

醉倚妙高台上月，玉簫吹徹洞龍眠。

才驚四座，復命賦「蔽月山房詩」，陽明隨口應聲道：

山近月遠覺月小，便道此山大於月；

若人有眼大如天，還見山小月更濶。

年僅十一歲的孩童，吐詞如此的豪邁與不凡，且富有哲學意境，由此可卜出他來日將成就一番聖賢的學問和超異的事功。

翌年就塾，才氣日漸縱橫，性格漸趨不羈，透關的想像，高深的見解已揭然若見，龍山公深以陽明過度早熟而懷憂慮，爲他延請塾師嚴加管教。可惜在這最重要的幾年，沒有名師來爲他指點，教學的內容只是一些科學時文之類，是以他常面對課本凝神靜思，終而轉向塾師請問：「何爲第一等事？」迂腐的塾師竟答：「惟讀書登第耳。」不以爲然的陽明則說：「登第恐怕不是第一等事，或讀書學聖賢耳。」在他幼嫩的腦海裏，已有了讀書、登第、做官並不是人生的最高目標，而認爲只有讀書學聖賢，完成自己的人格與德行，才是天下第一等事，其心智的不平凡，可想而知了。

由於沒有人指點他做聖賢，後來又轉而想做豪傑。十五歲那年，北方邊陲多事，他不畏艱苦，冒險出遊居庸三關，縱覽山川形勢，探詢諸夷虛實，慨然有經略四方的雄心大志。而十五歲的年齡，一切都未成熟，不能如願以償，這種豪壯的英雄氣慨，只有到夢裏發洩。有一首「夢中更賦詩」：

捲甲歸來馬伏波，早年兵法鬢毛皤；

雲埋銅柱雷轟折，六字題文尚不磨。



字裏行間，透露出他深慕歷史上偉蹟和豪傑的行徑，也顯露了他爲國立功，以期不朽的英雄思想，這對他將來的事功上，埋下了深深的根苗。

十七歲的秋天，奉親命往洪都（南昌）娶諸氏，成婚之日，偶步走進一座道觀鐵柱宮，見一道士正在打坐。因著他那不羈的好奇心和浪漫的情趣，便向道士詢以養生之道，並試著與道士相對學坐，一坐而忘歸，直到次日早晨才被人家找回。這是他的荒唐處，也正表現了他求真而忘我的哲人氣質，而這一夜的參悟，又種下了他日後想做道士的因緣。

明年，偕夫人回越途中，道經廣伏府（今江西省上饒縣）時，特去拜謁當時的大學者婁一齋（名諒），婁氏告以宋儒格物之學，並勉勵他：「聖賢必可學而至。」由此啟發了他嚮慕聖學的念頭，這確是他思想發展史上一个重要轉變歷程，而和宋儒講學的傳統開始有了接觸，這是陽明入理學的開始。

二十一歲在浙江考中了鄉試之後，又隨父親到京師。這時，他對宋儒格物之學大感興趣，日與諸友講析經義，夜則觀諸經子史，遍尋朱子遺書，潛心研讀。見朱子大學格物補傳釋大學格物致知學說：

「所謂致知在格物者，言欲致吾之知，在即物而窮其理也。蓋人心之靈，莫不有知，而天下之物，莫不有理。惟於理有未窮，故其知有不盡也。是以大學始教，必使學者即凡天下之物，莫不因其已知之理而益窮之，以求至乎其極。至於用力之久，而一旦豁然貫通焉，則衆物之表裏精粗無不到，而吾心之全體大用，無不明矣。此謂物格，此謂知之至也。」

這就是說，如能「窮理於物」（格物），即使一草一木，也包含了至高的道理，是理愈明而知愈至。陽明信仰朱子之言，和友人錢友同論做聖賢要「格」天下之物，因而依著朱子大學格物補傳的意見，首先去「格」庭前的竹子。他們整天面對竹子沈思默想，夙夜匪懈的竭其心思。錢友同「格」了三天，一格「不出道理來，勞神致疾而倒了，陽明認爲友人精力不足，沒有資格做聖賢，於是更認真的堅持下去，七月七日夜不得其理，也同樣病倒了，而竹子的道理，依然沒有格通。於是他深悟這樣格物不是做聖賢的工夫，他因此想聖賢有分，非他所能及者，因而放棄了朱子的學說，轉換他的興趣來研究辭章之學。曾和幾個朋友在龍泉寺結了一個詩社，終日吟咏，希望做個大文豪。可是第二年回京師看到國家邊疆危急需要軍事人才，便轉學武，遍尋兵家寶典，然而這方面他也沒有達到理想。這是陽明思想的又一次轉變，由於他既執著而又跳脫的性情，使他有多方面的生活



和新的嘗試，蓋英才天縱，博學為識，豈一才一藝所能拘之。

以上所述，是陽明早期的生活，充分的表現出他是一個具有多方面興趣的人。在這一階段裏，他的心中始終充滿著一股勇往直前的衝勁，熱烈追求的慾望，或企慕聖賢，或嚮往豪傑，或想起塵出世，或想學養生之道。畢竟他還太年輕，他的生活仍是不安穩的，但這段早期生活的特徵，仍可稱為他理想的孕育時期。

而經過幾次的挫折，幾次的轉變，陽明心志已有厭倦之意，功名不成，武事不遂，聖賢之學不可得，章辭之學又難以滿足雄心，正在彷徨失措之際，有一次讀到朱子上光宗疏：「居散持志，為讀書之本，循序致精，為讀書之法。」大悟過去好高騖遠，意志不定，所以一無所得。於是無主的心，逐漸安定下來，依了循序致精的法則讀書，終在二十八歲那年，登進士第，授刑部主事，旋攻兵部。在起初的幾年當中，他非常熱中政治，由於北方韃虜的猖獗不已，朝廷政治的積弊又深，基於耿耿忠心，會上奏邊務人事之策，痛切指陳時弊癥結所在，言極剴切，惜皆未被採納，滿腔愛國熱忱，換來的是朝廷的冷淡與漠視，失望之餘，又逐漸轉為消極，便告病回家。至三十一歲，他的思想和生命史上有了重大之轉變。年譜載：

「京中舊遊俱以才名相馳聘，學古詩交，先生歎曰：『吾焉能以有限精神為無用之虛文也。』遂告病歸越，築室陽明洞中行導引述，久之遂先知。……已而靜久，思離世遠去，唯祖母岑與龍山公在念，因循未決。久之，又忽悟曰：『此念生於孩提，此念可去，是斷滅種性矣！』明年遂移錢塘西湖，復思用世。」

迷途知返，頓悟到仙釋兩家並非自己的理想，只有儒學才是人生大道，於是離洞而去錢塘（今浙江杭州的西湖）養病，準備從靜寂的生活中自拔出來，振起儒家入世的精神，以實現救世的宏願。

這時，他面對江上的明月，回顧往事，而吟出他一片真摯的心聲：

江山孤臣一片心，幾徑漂沒水痕深；

極憐撐住即從古，正恐崩頽或自今。

蘚蝕秋螺殘老翠，蟻鳴春雨落空音；

好攜雙鶴磯頭坐，明月中宵一朗吟。



幾經掙扎與奮鬥，他終於找到應走的路子，在杭州並用這一理由，影響一個和尚還俗，這是陽明「良知」最早的發現，與「致良知」學說的萌芽，也是陽明有意於經世之學的開始。年譜載：

「秋主考山東鄉試，其策問議：國朝禮樂之制，老佛害道，由於聖學不明；紀綱不振，由於名器太濫，用人太急，求效太速。及分封，清戒，禦夷，息訟皆有成法，錄出人占先生經世之學。」

是陽明之學已開新境。三十四歲首次講學京師，與翰林庶吉士湛若水（甘泉）定交，以昌明聖學，矯時下士大夫久溺於詞章記誦之弊。那時，他對於聖學，雖特沒有深切的自信和真正的瞭解，更談不到成學，但他却毅然肩著傳播聖學牌子，並開始聚徒講學。這種精神正和他在越中山裏靜生求出世時一樣的心境，而透過若水和若水老師陳白沙的牽引，陽明開始接觸到象山的思想，露出了心學的光芒。雖然這只是一個開始，離他後來的大放光明，還有一段很長的磨鍊，然而，在他的思想史上，仍是一個重要的轉捩點。

三十五歲時，武宗初政，劉瑾竊柄，戴銑等人以諫忤旨繫獄，陽明抗疏相奏，亦下詔獄，廷杖四十，死而復甦，遠謫貴州龍場（今修文縣）驛丞。龍場位於貴州省城的山北，在萬山叢棘之中，苗獠雜居，瘴癘偏地，侍徒三僕皆染疫抱病，陽明親自上山砍柴，臨池取水，因念聖人處此，更有何道？他感慨的說：「那等境地，就是叫聖人處此，也沒得說了。」年譜三十七歲：

「（先生）自計得失榮辱，皆能超脫，惟生死一念尚覺未化。乃為石槨，自誓曰：『言淮俟命而已』，日夜端居，濛濛以求靜一。久之，胸中灑灑而從者皆病。自折薪取水，作糜飼之。又恐其抑鬱，則與歌詩。又不說，復詞越曲雜以談笑，始能忘其為疾病夷狄患難也。因念聖人處此，更有何道？」

生活在這種環境中，一切的理想都成泡影。只有面對群峯，默默沉思不已。其實，這種環境，正是鍛鍊聖人、培養聖人之所，孟子所謂：「天將降大任於斯人也，必先勞其筋骨，餓其體膚，空乏其身，行拂亂其所為，所以動心忍性，增益其所不能……」是也。

陽明在這惡劣的環境裏，終於磨出了他的光輝。就在某一個深夜，他忽然悟出了格物致知的道理，好像有人在夢中告訴他



似的，不覺呼躍而起，從者皆驚。原來他領悟到聖人之道，自己心裏已經有了，他回答說：「始知聖人之道，吾性自足，向之求理於事物，誤也。」他便默記五經之言以證，莫不脗合，於是二十多年來心中所鬱結的塊壘豁然開朗，這就是陽明入道的開始。自此以後，他反對朱子的窮理於外物之學，而主張求理於內心，即是把心與理合而為一之學，由這學說推行為「致良知」、「知行合一」，而奠定了他整個思想之體系。次年，在貴陽主講貴陽書院，開始論「知行合一」之學，他說：「知是行之始，行實知之成。聖學只有一個工夫，知行不可分為兩種事。」

三年的謫居，對陽明個人來說，固然是畢生一大困厄與不幸；然而這三年的時間，却正是他一生思想學問上最大的轉變。他超脫了一切心靈的蔽障，拂拭了心境上的塵埃，徹悟了格物致知的真旨，確定了知行合一的學說。磨出了動心忍性的意志，完成了他做世間第一人第一等事的志願。所以，這三年痛苦的磨鍊，與痛苦中對真理的覺悟，對他一生的成就，有極深切的影響。

正德四年，陽明被朝廷赦還，在廬陵知縣任內，他抱定「為政不用威刑，惟以開導人心」的原則去做，以德化民的結果，全縣大治。不久，劉瑾伏誅，陽明奉召返京，任南京刑部主事，講學論「實踐」之功，講真性，講心體。他說：

「學者欲為聖人，必須廓清心體，使纖翳不留，真性始見。」

這所謂真性與心體，已涉及「良知」，但尚未直接講出「致良知」三個字，又恐學者疑其難，他又說：

「聖人之心如明鏡，纖翳自無所容，自不消磨刮。若常人之心，如斑駁蝕之鏡，須痛刮磨一番，盡去駁蝕，然後纖塵即見，纔拂便去，亦不消費力，到此已是識得仁體矣。若駁蝕未去，其間固有一點明處，塵埃之落，固亦見得，纔拂便去。至於堆積於駁蝕之上，終弗之能見也。此學利困勉之所由異，幸勿以為難而疑之。」

四十三歲升任南京鴻臚寺卿，在南京講學，為了針砭末俗，總是指點學子存天理，去人欲，教他們蕩滌心胸，留得清明，始能辯識心性的本體。

陽明四十五歲開始，直到他逝世為止，是他建立事功的時期，也是他思想最成熟、最圓融的時期，不僅由一個書生，做到獨當一面的大軍統帥，充分的表現了他的軍事天才；講學方面，他所創的學說，更能融通體用，完成體系，與輝煌的事功相得



益彰，尤以五十歲時居南昌，講學白鹿洞時，揭櫫的「致良知」之教，更是陽明歷經危難，從百死千劫中證驗，鍛鍊出來的真學問。陽明在經過宸濠、忠（張忠）、泰（許泰）之變後，益信良知真足以忘慮難出生死，是以曰：「我此『良知』二字，實千古聖聖相傳一點滴骨血也。」又曰：「基於此良知之說，從千死百難中得來，不得已與人一口說書，只恐學者得之，容易把一種光景玩弄，不落實用功，負此知耳。」於是更一依良知而行，不與世俗同流合污。五十三歲因父喪在家守孝，講學多年，慕名問學者，比肩接踵而來，於是特別開闢一座稽山書院，聽學者盛況空前，陽明向大家開發致良知與心理合一之理，「答顧東橋書」有曰：

「朱子所謂格物云者，是以吾心而求理於事事物物之中。」

「吾心之良知，即所謂天理也。致吾心之天理於事事物物，則事事物物皆得其理矣。」

要使人各自尋求一己的本性，則當致極良知而達於止於至善的境界。五十六歲，兼都察院左都御史、征思田，啟行前夕，陽明爲了錢德洪與王汝中的爭論「究竟話頭」，在天泉橋上證道，說出四句宗旨。陽明曰：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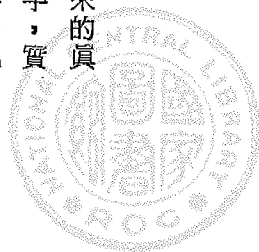
「二君已後與學者言，務要依我四句宗旨：『無善無惡是心之體，有善有惡是意之動，知善知惡是良知，爲善去惡是格物。』以此自修，直躋於聖位，以此接人，更無差矣。」

這也就是「正心、誠意、致知、格物」的工夫。又曰：

「此是徹上徹下語，自初學以至聖人，只此功夫。初學至此，循循有入，雖至聖人，窮究無盡。堯舜精一功夫，亦只如此。」

五十七歲，平定廣西苗亂，而病又日篤，上疏乞歸骸骨，舟行至江西南安的青龍鋪，自知不起，門人問積請問有無遺囑？陽明笑曰：「此心光明，亦復何言。」頃刻而瞿目長逝。

陽明之學，始泛濫於詞章，再沈思於朱子之書，繼而出入佛老之門，及至居夷處困，動心忍性，而悟聖人之道吾性自足，不假外求，於是破宋儒之成說，捨棄枝葉，直探聖學之本源，簡單明白的提出「致良知」之學，其教學經歷，也是以「致良知」爲最後歸趣，無一不以教學者支離眩滅，務華而絕根之病。此「致良知」之學是陽明最高之理想，亦是陽明最真切的教育哲



學，由此理想，使得他的教育對象普遍到社會的每一個層面。

黃梨洲在明儒學案謂陽明之學有前三變與後三變之不同。蓋前三變是與質的轉變，後三變則是一根同質的發展，是同一個系統的圓熟完成，在工夫上雖有勉與純熟之別，在義理骨幹上則並沒有什麼改變。

綜觀陽明的一生，實可算為以身教身，以心教心，最具體的一個實例，而因為他的良知學平易親切，往往使人忽略了他成學前的一番磨練。因此，吾們有志研究王學的人，切不可忽略了陽明成學前的一番艱苦奮鬥的經歷，否則將無法瞭解他教育理想下所賦予的最簡易、最直捷的生活體驗。

叁、陽明的教育思想

陽明學生講學，其所謂「心即理」、「知行合一」、「致良知」、「仁」、「性」，無一不是反覆闡明「存天理而去人欲」，恢復良知本體，並見之於行事，達「以禮講理而行理」之道，期使個人能成其德，各守其位，各盡其職，各安其分，各勤其業，以成一安和樂利之世界大同社會。其個人的修養在此，其教人之篤實踐履處亦在此。

由於陽明對教育的重視，故他一生，不論在朝、在野、逆境、順境、憂而戎馬倥傯之際，也從未輟其講學之行。二十年來，受業甚多，縱遊之士徧於南北。或謹讀戒懼，以修持，收斂為功，或虛靈寂照，以了悟，發散為事，陽明皆能因其才能，各施其教，或親臨講席，或耳提面命，皆能使學者心領而神會也。

拘括王文成公全集，尤其是傳習錄與大學問部分，研究陽明講學的精神，其教育思想即根據良知論加以發揮而來，故論教育宗旨，即是其在天泉橋上證道所說出的那四句宗旨：

「無善無惡是心之體，有善有惡是意之動，知善知惡是良知，為善去惡是格物。」（天泉證道）
這四句教言，是先開「心、意、知、物」四面，以揭示一德性實踐的內在義路。陽明咸認為以此自修，當可直躋於聖人之位，以此接人，則無差矣。論教育目的，則以「致良知」為主，他曾說：



「自聖人以下，不能無蔽，故須格物以致其知。」（傳習錄上）

「夫良知即是道。」（同上）

要能人人明白良知良能乃人所共有，故爲聖之道，只須存在天理上用功。論教學方法，則依據爲人良知煥發程度之不同，而主張因材施教。他說：

「聖人教人，不是個束縛他通做一般。只如狂者便從狂處成就他，狷者便從狷處成就他，人之才氣，如何同得？」（傳習錄中）

陽明認爲人各隨其才份而皆可有所致，故而他的點化也是因人而異，各遂其能而達於所能至的境地。是陽明之教育思想乃爲其哲學思想的引伸。茲分敘於下：

一、教育宗旨

陽明之學，講理以禮，其行理亦以禮，曰：「禮者，理也。」又曰：「理，一而已矣。」故其禮之表示於其行動者，有六種風度：謙虛、和藹、容忍、誠懇、反己、藝術。黃宗義謂：

「大凡學有宗旨，是其人之得力處，亦即學者之入門處，天下之義理無窮，苟非定以一二字，如何約之使其在我。」（明儒學案發凡）

政所謂宗旨者，標出一兩個字或一兩句話，以代表其學術的全部精神。是以前所述的天泉證道的四句教即爲陽明的教育宗旨。觀乎傳習錄及年譜亦皆有記載：

「此後與朋友講學，切不可失了我的宗旨。無善無惡是心之體，有善有惡是意之動；知善知惡是良知，爲善去惡是格物。只依我這話頭，隨人指點，自沒病痛。」（傳習錄下）

「二君以後與學者言，務要依我四句宗旨。無善無惡心之體，有善有惡意之動，知善知惡是良知，爲善去惡是格物。以此自修，直躋聖位，以此接人，更無差矣。」（年譜）

其爲陽明教育的宗旨，自初學以致聖人，均可以此爲教，故王龍溪天泉證道記曰：



「陽明夫子之學，以良知爲宗，每與門人論學，提四句爲教法。」

則陽明學的最高境界，在合人生與自然爲一原，融外物與內心爲一體，也就是中庸所謂：「贊天地之化育，以與天地參。」及「合內外之道者」同意。

二教育目的

陽明的教育目的，散見全書，略附錄於後，以窺其所指。

陽明教育的目的，在於「立志」。

「志不立，天下無可成之事，雖百工技藝，未有不本於志者。今學者曠廢墮墮，玩歲愒日，而百無所成，皆由於志之未立耳。故立志而聖，則聖矣；立志而賢，則賢矣。志不立，如無舵之舟，無銜之馬，漂蕩奔逸，終亦何所底乎？」（教條示龍場諸生：立志）

「夫學莫先於立志，志之不立，猶不種其根，而徒事培壅灌溉，勞苦無成矣。世之所以因循苟且，隨俗習非，而卒歸於污下者，凡以志之弗立也。故程子曰：『有求爲聖人之志，然後可與共學。』人苟誠有求爲聖人之志，則必思聖人之所以爲聖人者安在，非以其心之純乎天理而無人欲之私歟？聖人之所以爲聖人，惟以其心之純乎天理而無人欲，則我之欲爲聖人，亦惟於此心之純乎天理而無人欲耳。欲此心之純乎天理而無人欲，則必去人欲而存天理。」（示弟立志說）

對弟子門人亦多有立志說，如謂李侯璧言其輩學問之所以未得長進，只是未立一志，則知立志爲陽明教育的目的。

或以爲教育的目的，在「克己」、「成己」。

「……凡攻我之失者，皆我師也，安可以不樂受而心感之乎？某於道未有所得，其學鹵莽耳……諸生責善，當自吾始。」（教條示龍諸生：責善）

「先生曰：『毀謗自外來的，雖聖人如何免得。人只貴於自修，若自己實實落落是個聖賢，縱然人都毀他，也說他不著，却若浮雲揜日，如何損得日的光明。』」（傳習錄下）

「蕭惠問：『己私難克奈何？』先生曰：『將汝己私，來替汝克。』又曰：『人須有爲己之心，方能克己。能克己，才能



成己。』……先生曰：『……這視、聽、言、動、皆是汝心，汝心之視，發竅於目；汝心之聽，發竅於耳；汝心之言，發竅於口；汝心之動，發竅於四肢；若無汝心，使無耳、目、口、鼻。……所謂汝心，却是那個能視、聽、言、動的，這個便是性，便是天理。有這個性纔能生這性之天理，便謂之仁。……這心之本體，原只是個天理，原無非理，這個便是汝之真己。……便須常常保守著這個真己的本體……方能克己……』（傳習錄上）

子曰：「一日克己復禮，天下歸仁。」陽明以「克己」之工夫，從自己做起，實實在在的反己，並以自修止謗，這正是所謂「恭己厚而薄責於人者」也，其結果，將是成己。

或以為教育的目的在「存天理去人欲」。

「希淵（蔡克克）問：『聖人可學而至，然伯夷伊尹於孔子，才力終不同，其同謂之聖者安在？』先生曰：『聖人之所以為聖，只是其心純乎天理，而無人欲之雜，猶精金之所以為精，但以其成色足而無銅鉛之雜也。人到純乎天理方是聖，金到足色方是精。然聖人之才力，亦有大小不同，猶金之分兩有輕重，堯舜猶萬鎰，文王孔子有九千鎰，禹湯武王猶七、八千鎰，伯夷伊尹猶四、五千鎰，才力不同，而純乎天理則同，皆可謂之聖人。……所以為聖者，在純乎天理，而不在人力也。故雖凡人，而皆肯為學，使此人純乎天理，則亦可為聖人。……後世不知作聖人之本是純乎天理，却專去知識才能上求聖人，以為聖人無所不知，無所不能，必須是將聖人許多知識才能，逐一理會始得，故不務去天理上著工夫，徒弊精竭力，從冊子上鑽研，名物上考索，形迹上比擬，知識欲廣而人欲愈滋，才力愈多而天理愈蔽。』」（傳習錄上）

「德章（袁夢麟）曰：『聞先生以精金喻聖，以分兩喻聖人之份量，以鍛鍊喻學者之工夫，最為深切。惟謂堯舜為萬鎰，孔子為九千鎰，疑未安。』先生曰：『此又是軀殼上起念，故替聖人爭分兩，若不從軀殼上起念，即堯舜萬鎰不為多，孔子九千鎰不為少。……所以謂之聖，只論精一，不論多寡，只要此心純乎天理處向，便同謂之聖。……後儒只在分兩上較量，所以流入功利。若除去了分兩的心，各人儘著自己力量精神，只在此心純天理上用功，即人人自有，個個圓成。』」（傳習錄上）

陽明此喻，即是要人立志去人欲存天理，良知發展到最高處，人人皆可以為堯舜，即使愚夫愚婦，若能存乎天理而無一毫人欲



之私，亦可以入聖矣。

或以爲教育的目的，在「致良知」。

「若無有欲牽蔽，但循著良知發用流行將去，卽無不是道。……學者學循此良知而已。謂之知學，只是知得在學循良知。」（傳習錄下）

「心之良知是謂聖，聖人之學，惟是致此良知而已。自然而致之者，聖人也；勉強而致之者，賢人也；自蔽自昧而不肯致之者，愚人不省者也。愚人不省者，雖其蔽昧之極，良知又未嘗不存也，苟能致之，卽與聖人無異矣！此良知所以爲是愚之同具，而人皆可以爲堯舜者以此也。」（傳習錄下）

則良知存於人也，無古今，無聖愚，無不同也，誠能致其良知，世上之善惡是非無不明矣。

綜上所述，陽明論教育的目的，乃是以「致良知」爲前提，凡是能致其良知者，必可變化氣質，去其私人之欲直指本心，而達天人合一的境界。

因此，陽明在答友人書中說：

「君子之學，務求在己而已。毀譽榮辱之來，非獨不以動其心，且資之以爲切磋砥礪之地。故君子無入而不自得，正以其入而非學也。若夫聞譽而喜，聞毀而戚，則將惶惶於外，惟曰不足矣！其何以爲君子。」（答友人書）

故明代馮河常論曰：

「陽明之學只在致良知，致良知只在去人欲存天理，千言萬語皆是此意。」

二 教學方法

陽明的教育思想，最重要者在其主張人皆可以爲堯舜，因此他的教育對象，普及社會各個階層人物，是則陽明的講學無一定教法，正如其所云：

「夫理無內外，性無內外……故學無內外。講習討論，未嘗非內也；反視內省，未嘗遺外也。」（傳習錄中）

又云：



「學校之中，惟以成德爲事，而才能之異，或有長於禮樂，長於政教，長於水土播植，則就其成德，而因使益精。」（傳習錄中）

是以，陽明認爲教育的功能，在於發揚使人各成其德，各效其能。以此爲目標，擴而爲之，表現在陽明講學上，是內外並重，本末兼該，可謂「無入而不自得」，因此，要研討陽明教法方法，先要瞭解陽明講學的精神。

陽明之學，乃是心學，凡心學莫不以「心」爲宇宙至高無上的主宰，故陽明說：

「心即理也。」（與徐愛問答）

陽明講心，注重「知覺者」，較理學家講「心」更爲透澈。他說：

「可知充天塞地，只有這個靈明，人只爲形體自間隔了。我的靈明，便是天地鬼神的主宰。」（傳習錄下）

因爲他認識了「心」爲宇宙的主宰。因此，陽明講學的精神是求「心之所安」。而「心之所安」卽爲「大公無私」、「實事求是」與「實踐良知」。這四大精神，就是陽明治學與講學的中心思想，以此而講，則陽明教學的方法，約可分成下列三種：

（一）因材施教：

王門弟子，由近而遠，起初從學，不過限於鄉里間，如徐曰仁、蔡希淵、朱守中等是。陽明會說：「徐曰仁之溫恭，蔡希淵之深潛，朱守中之門敏，皆予所不逮也。」自謫居龍場，倡知行合一之學後，四方來受業者更多。他在給孟源書中會說：

「聖賢之學，坦如大路，但知所從入，苟循循而進，各隨分量，皆有所至。後學厭常喜異，往往時入斷蹊曲徑，用力愈勞，去道愈遠。」

又說：

「我輩致知，只是各隨分限所及。今日良知見在如此，只隨今日所知擴充到底，明白良知又有開悟，便從明日所知擴充到底，如此方是精一功夫。與人論學，亦須隨人分限所及，如樹有這萌芽，只把這些水去灌溉。萌芽再長，便又加水。自拱把以至合抱，灌溉之功，皆是隨其分限所及。若些小萌芽，有一桶水在盡要傾上，便浸壞他了。」（傳習錄中）

陽明認定了教學如同良醫之治病，要在去病而已，病理因人而異，卽有一定之方：



「夫良醫之治病，隨其疾之虛實強弱寒熱內外，而斟酌加減調理補泄之，要在去病而已，初無一定之方，不而證候之如何，而必使人人服之也，君子養心之學亦何異於是。」（傳習錄中）

因此，當弟子王汝止與董蘿石出遊，所見者雖相同，陽明的點化即因人而異，達其所能至之境：

「先生鍛鍊人處，一言之下，感人最深。一日，王汝止出遊歸，先生問曰：『遊何見？』對曰：『見滿街人都是聖人。』先生曰：『你看滿街人都是聖人，滿街人到看你是聖人在。』又一日，董蘿石出遊而歸，見先生曰：『今日見一异事。』先生曰：『何异？』對曰：『見滿街都是聖人。』先生曰：『此亦常事耳，何足爲异？』蓋汝止圭角未融，蘿石恍然見有悟，故問回答异，皆反其言而進之。」（傳習錄中）

問題相同，所答看不同，却是從他們言語的反面，期求增加他們的造詣。蓋汝止還露些鋒芒，而蘿石雖然尚未真切地見出聖人之道但已若有所悟，所以陽明針對他們不同的材性悟處給予不同的启示，此即爲陽明的教育精神，他已把握了教育上最根本的要點，所以因材施教，無往而不適。

其次，陽明對兒童的教學，更加注意，他主張教童子以歌詩、習禮、讀書三事，而不專在誦讀。其云：

「今教童子，惟當以孝弟忠仁禮義廉恥爲專務。其栽培涵養之方，則宜誘之詩歌，以發其志意；導之習禮，以肅其威儀；諷之讀書，以開其知覺。今人往往以歌詩習禮爲不切時務，此皆末俗庸鄙之見，烏足以知古人立教之意哉。大抵童子之情，樂嬉遊而憚拘檢，如草木之始萌芽，舒暢之則條達，摧撓之則萎瘁。今教童子，必使其趨向鼓舞，中心喜悅，則其進自不能已。……故凡誘之歌詩者，非但發其志意而已，亦所以洩其跳號呼嘯於詠歌，宣其幽抑結滯於音節也。」（傳習錄中，訓蒙大意）

他對童子教以歌詩，發其興趣，這是很好的見解，同時，並約以教約，使之歌詩的正確方法：

「凡歌詩，從要整容定氣，清朗其聲音，均審其節調，毋躁而急，毋蕩而囂，毋餒而癡，入則精神宣暢，心氣和平矣。每學童童生多寡，分爲四班，每日輪一班歌詩，其餘皆就席歛容肅聽，每五日則說四班遞歌於本學，每朔望集各學會歌於書院。」（同上、教約）



這種方式，毋寧說是契合近代教育上之重視實習教學者相同。再以習禮而論，陽明認為：

「導之習禮者，非但肅其威儀而已，亦所以周旋揖讓，而動盪其血脈，拜起屈伸，而固束其筋骸也。」（同上、教約）其方法是：

「凡習禮，須要澄心肅慮，審其儀節，度其容止，毋忽而惰，毋視而作，毋徑而野，從容而不失之迂緩，脩謹而不失之拘局，久則體貌習熟，德行堅定矣。」（同上、訓蒙大意）

授書方而，陽明依先立教之意，而闡發如下：

「諷之讀書者，非但開其知覺而已，亦所以沈潛反復而存其心，抑揚諷誦以宣其志也。凡此皆所以順導其志意，諷理其性情，潛消其鄙吝，默化其蠢頑，日使之漸於禮義而不苦其難，入於中和而不知其故，是蓋先生立教之微意也。」（傳習錄中，訓蒙大意）

其方法是：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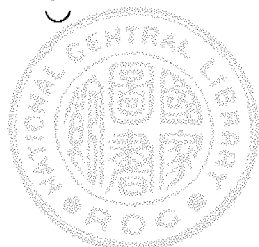
「凡授書，不在徒爲，但貴精，量其資稟，能二百字者，止可授以一百字，常使精神力重有餘，則無厭苦之患，而有自得之美。諷誦之際，務令專心一志，口誦心惟，字字句句，紬繹反覆，抑揚其音節，寬虛其心意，久則義禮浹洽，聰明日開矣。」（傳習錄中，訓蒙大意）

陽明認爲，人的分限不同，童子有童子的學問，自不必強與大人相同；人只就其所致的分限去致良知即可，因此他反對教師日以句讀之學來教童子，專責其聰明與否而不計較其行爲之善惡，或者鞭撻繩縛，嚴格一如對待囚犯，使童子視上學爲畏途，比師長如寇仇，終至規避跪詐以逃避，致人格日趨下流。這種教學方法與今日教育的宗旨相契合。

（二）啟發真性：

陽明教育思想，可說是以心學著手，以身教爲先，學者始能誠服，內外始能如一。因此他的教育方法，特別重視啟發教學。有這麼一段話：

「聖人亦是學知，衆人亦是生知，這良知人人皆有，聖人只是保全無些障礙，兢兢業業，亶亶翼翼，自然不息，便也是學



。只是生的分數多，所以謂之生知安行，任人自孩提之童，莫不兼具如此知，只是障蔽爲多。然本體之知，自難泯息，雖向學克治，也只憑他只是學的分數多，所以謂之學知利行。」（傳習錄上）

這本體的知，便是一種生知，一種心有生機，自知不斷的向上努力的知。所以生知和學知，其結果是相同的，只是學知者其心有了障蔽；所以必須先在學上下功夫，不若生知者之本體自有生機。概聖人之異於人者，只是聖人從良知本體上生的分數多，向外學的分數少，而一般人的良知本體，多有障蔽，則像是其生的分數少，而需要學的分數自然多了。這良知既是與生俱有，不待外爍，則只要啟發心中原有的良知，使障蔽減少，則人人自可爲聖人。所以謂陽明之學特重啟發真性。

陽明所謂的啟發人心中原有的良知，即是點化，而人的才智不同，分限不一，是其點化不需有一定的程限與條件，但要身教爲上，言行一致，力求實踐即可。傳習錄上記載了陽明許多啟發人的故事，特錄數段於後：

「汝中丙戎會試歸，爲先生道途中講學，有信有不信。先生曰：『你們拿一個聖人去與人講學，人見聖人來，都怕走了，如何講得行，須做個愚夫愚婦，方可與人講學。』」

「其又言今日要見人品高下最易。先生曰：『何以見之？』對曰：『先生譬如泰山在前，有不知仰者，須是無目人。』先生曰：『泰山不如平地大，平地有何可見？』先生一言翦裁，剖破終年爲外好高之病，在座者莫不悚懼。」

這兩段話是極有深意的啟發，要施教者，自己也如同愚夫愚婦，不要自己站在高出愚夫愚婦的聖人地位來教人，亦却讓受教育能站在認同的地位，是教人須從受教者的分限上來教，從受教者當前的良知來教。設若施教者像泰山般高高在上，受教育難以仰望，則施教者將何以點化？此即上文所說人見聖人來，都怕走了，如何講得行。所以要讓聖人也如愚夫愚婦般，讓別人不見高出，却也平易可親，待受教者自心自發，然後纔能點化那些愚夫愚婦的受者，這一層極爲重要。

傳習錄上又一段記載：

「孟源有自是好名之病，先生屢責之。一日，警責方已，一友自陳日來工夫請正。源從旁曰：『此方是尋着源舊時家當。』先生曰：『爾病又發。』源包攬；議擬欲有所辯，先生曰：『爾病又發。』因喻之曰：『是汝一生大病根。譬如方丈地內，種此一大樹，雨露之滋，土脈之力，只滋養得這個大根。四旁縱要種些嘉穀，上面被此樹葉遮覆，下面被此樹根盤結



，如何生長得成？須用力伐去此樹，纖根勿留，方可種榘嘉種。不然任汝耕耘培壅，只是滋養得此根。」

陽明良知之學，直指心性本體，簡易不當，又多用在日常生活行爲上，針對對方缺失加以點化，如暮鼓晨鐘，發人深省。他並不重在提供人理論，却專重在指示人工夫。他的理論，早已把來工天化了，只有尋向本源，啟發得人人內心自有的良知出來，則道理自可明，知識自可進，則愚夫愚婦亦自可與知與能了。

傳習錄裏更記有二段感人的事蹟：

「鄉人有父子訟獄，請訴於先生，待者欲阻之。先生聽之，言不終辭，其父子相抱慟哭而去。柴鳴治入向曰：『先生何言，致我感悔之速？』先生曰：『我言舜是大不孝的子，瞽瞍是世間大慈的父。』鳴治愕然請向。先生曰：『舜常自以爲大不孝，所以能孝，瞽瞍常自以爲大慈，所以不能慈。瞽瞍只記得舜是我孩提長的，今何不會豫悅我，不知自己爲後妻所移了，尚謂自家能慈，所以愈不能慈。舜只思父孩提我時，如何愛我，今日不愛，只是我不能盡者，日思所以不能盡孝，所以愈能孝。及至瞽瞍底豫時，又不過復得此心原慈的本體，所以後世稱舜是個古今大孝的子，瞽瞍亦做成個慈父。』」

這一段極真簡明的譬喻；是何等接近和貼切，指出的那一番大舜的孝心原也親切動人，是愚夫愚婦也能懂得的，可見大舜在良知上，還是和愚夫愚婦一般，何嘗見其高出呢？這就是專從人生而具有的良知本性來啟發，其他從外面去講的知識理論一概用不着，這也是陽明學中最簡易、最親切、最主要的方法。

(三)反求諸己：

陽明教學，既重啟發，又重教人反省，其云：

「人有過，多於過上用功，就是補甌，其流必歸於文過。」（傳習錄中）

這是說，人都知道用工夫，却是那工夫用錯了，是以要反之於心才是。

傳習錄記載一段陽明論爲學工夫說：

「教人爲學，不可執一偏，初學時，心猿意馬，拴縛不定，其所思慮多是人欲一邊，故且教之靜坐息思慮。又之，俟其心意稍定，只懸空靜守，如槁木死灰，亦無用，須教他省察克治。省察克治之功，則無時可間，如去盜賊，須有個掃除廓清



之意。無事時，將好色好貨好名等逐一追究搜尋出來，定要拔去病根，永不復起，才始爲快。」（傳習錄上）

這是陽明論爲學的功夫，全在個人內心的工夫上，是否已摒除私念，已掃除廓清，不得有一絲姑息，一線私慾，一念論人是非的心跡，但循自己的良知，來分辨是非。即或外界譏謗加身，在要念譏謗乃外來的，雖聖人又何可免得，何況只怕外界的譏謗，正是自己不懂得自修自省而來的，若自己一心無私，依著良知而行，也就不須避人譏謗了。正如傳習錄下記載：

「一友常易動氣責人，先生警之曰：學須反己，若徒責人，只見得人不是，不見自己非；若能反己，方見自己有許多未盡處，奚暇責人？……」

「譏謗自外來的，雖聖人如何免得，人只貴於自修，若自己實實落落是個聖賢，縱然人都毀他，也說他不着，却若浮雲掩日，如何損得日的光明？……只要自修如何。」

反己，則無暇責人，自修，則譏謗自免。陽明自己用功如此，所以他教人，也不重在揭發他人不是，而只重在啟發自己的良知。

肆、陽明教育精神的流傳

一、對當時學界的影響

陽明學說，在當時已流傳得很廣，所傳授的弟子也極多，儼然成爲明代學術的主流，朱派理學家已無足與抗衡。概陽明的良知學，本來就是一種淺顯易懂的社會大眾性的哲學，其所以提出了「知行合一」的口號，乃是爲補救學校教育的缺失。

把知行分爲兩件事，而且認爲知在先行在後，是當時一般人易陷的錯誤，陽明提倡知行合一，他的用意，即是一種補偏救弊的方法，而偏重在行的一方面。

承襲陽明思想的學者，依黃梨洲明儒學案分列，除陽明本人立姚江學案外，並依陽明弟子分布的區域，則有浙中的徐愛、錢德洪、王畿等十八人，江右的鄒守益、羅洪先、聶豹、劉文敏等二十七人，南中的黃省曾、朱得之、唐順之等九人，楚中的



蔣信（後又師甘泉）、冀元亨二人，北方的穆孔暉、孟秋、尤時熙、張俊覺、南大吉等七人，粵間的薛侃、周垣二人，及泰州的主良等七派，真可說是盛極一時，而最能實踐陽明良知學工社會性的教育精神，最能注重陽明力行哲學者，首推泰州學派，其中以王良的成就最大。黃梨洲曾說：

「陽明先生之學，有泰州龍溪而風行天下。」（明儒學案泰州學案）

所謂泰州，乃王心齋也，與龍溪號王門二王。心齋名良，字汝止，號心齋，泰州（今江蘇泰縣）人，是泰州學派的開山師祖，少時，因家貧，不能竟學，商於山東，年廿五過闕里，而勵志向學，置孝經論語大學於袖中，逢人質義，信口談解，如有所啟，即以經證悟，以悟釋經。三十二講說書經，並傳大學格物之學，多所自得，不拘泥傳注。正德十五年聞陽明在江西講良知之學，以為「王公論良知，良談格物，如其同也，是天以公與天下後世也。如其異也，是天以良與王公也。」於是啟行以古服往見，辯難良久，心折歎曰：「簡易直捷，良不及也。」乃下拜執弟子禮。退而繹其所聞，感到聞有不合，登時悔曰：「吾輕易矣。」次日入見陽明，告曰：「良太輕易矣。」陽明曰：「善哉，子之不輕信從也。」心齋乃復據上坐，又辯難良久，始大服，遂為弟子如初。陽明對門人道：「問者吾擒宸濠，一無所動，今却為斯人動矣。」後陽明歸越，心齋亦從行，來學者多從心齋指導，其後心齋欲自任傳師教於天下，乃製小車，號為蒲輪，北上講學，招搖以入京師。同門歐陽德等駭異，勸他歸來，陽明亦移書責之，心齋始還會稽。陽明以其意氣太高，行事太奇，痛加裁仰，乃自三日不見。陽明送客出門，心齋長跪道旁曰：「良知過矣。」陽明不顧而入，心齋隨入內，方為師亂如初。陽明卒於師次，心齋迎哭至桐廬，經紀其家而後返。歸而講學；遠近皆至，同門會講者，必請心齋主席。心齋於談論間，省覺人最為。年五十八年。（參考明儒王心齋先生選集卷三年譜）

心齋之思想，以實行為根本，其要在格物安身二義。他以反己為格物，以止於至善為安身。見於他最著名的淮南格物說的有：

「止於至善者，安身也。安身者，立天下之大本也。身也者，天地萬物之本，天地萬物，未也。」

「以經而知安身之為止於至善也。知止，知安身也，安靜，安慮得安身而止於善也。物有本末，故物格而後知本也。知本，知之止也，知至，知止也。自天子至此謂知之至也，乃是釋格物致知之義，身與天下國家一物也，唯一而有本末之謂。」



格、絮度也，絮度於本末之間，而知本亂而未治者否矣，此格物也。」

「格物之物，即物有本末之物。其本亂而未治者否矣，其所厚者薄，而其所薄者厚，未之有也。此格物也。故即繼之曰：此謂知本，此謂知至也。」

「格物，知本也，立本，安身也。安身以安家而家齊，安身以安天下而天下平。知得身是天下之本……知得身是天下國家之本；則以天地萬物依於己，不以己依於天地萬物。」

「格如格式之格，即絮矩之謂也。吾心一矩也，天下國家如一方形，矩正則方形亦正，故心正則天下國家亦正，方形正則格成，故曰物格。」

總括心齋格物說的重要意義，乃是謂正己而後正物，以反求諸己為格物的工夫；並以安身為本，以止於止善為安身的修養，而認定身安而後家天下始可保。誠如易曰：「身安而天下國家可保也。」這說法很有新意，且是很切實的正己正人的主張。

陽明的良知學，雖說是一種社會大眾性的哲學，但他專提良知，人人生而具有的良知，則他的重點已放在個人身上。心齋學宋陽明，主張事上研磨，其釋良知，天理，求於心等事，亦是一本陽明之學說，並更進一步倡明哲保身論，謂如知保身而不知愛人，必至於一切為己，終將利己而害人，人亦以此對我，我此身終將不可自保，又如何以保國家天下？以是知心齋保身之說，即仁者愛人，信者信人之道。這種思想，在社會教育方面，具有重大的貢獻。於是他提倡了他所謂樂學之教，曰：

「人心本自樂，自將私欲縛，私欲一萌時，良知還自覺。一覺使消除，人心依舊樂。樂是樂此學，學是學此樂。不樂不是學，不學不是樂。樂便然後學，學便然後樂，樂是學，學是樂。於乎！天下之樂，何如此學；天下之學，何如此樂！」（遺集卷二百九）

以良知之好覺，施之於學問實踐，是何等活潑自然之氣象。這科樂學的主張，在教育學上是很好的見解。他又說：

「天下之學，惟有聖人之學曰好學，不費些子氣力，有無邊快樂。若費些子氣力，便不是聖人之學，便不樂。」（遺書卷一頁二）

這是把學問與興趣合而為一，即今日所謂：「從遊戲之中學」。這樣的樂學，自然是不費力，而效果宏大。



總括心齋教育思想，乃本陽明良知學而發皇，加上重學實行的精神，在我國教育上，是一條新創的道路。
二對日本的影響

王陽明全集之傳入日本，是在江戶初期事，日本陽明學，中江藤樹為提倡之第一人，乃日人所承認。然陽明學之流傳於日本，實在藤樹之前。早在陽明生前，陽明學已與日人有了關係。正德六年，日本派了一位八十七歲的和尙使者桂悟了庵來到我國，住了兩年，當正德八年，了庵自寧波歸國時，陽明正好在浙中，因與了庵見了面，惜別之時，贈送序一篇，或曰：「年踰上壽，學而不倦。」或曰：「見其法客潔脩，律行堅鞏，坐一室左右經書，鉛朱自陶。」或曰：「心日益講，志日益淨。」對了庵人品學問，至為推榮。是了庵與陽明晤見後，日人始知有陽明。

惟，我們對日本學界研究陽明學所知有限，筆者所知更為淺薄，試依張君勵比較中日陽明學為參考，試作分析如下：

十七世紀初，中江藤樹所倡導的陽明學派開始風行，是為元祖。朱子學以官學的立場標榜教育主義，陽明學則以私學的立場，由民間學者的贊助邁向平民教育的目標，因為普及，而成為民間的潛在勢力。國父在以「中國應建設共和國」為題的演說裏提到日本的舊文明是由中國輸入的，日本的志工認識了陽明的知行合一學說，並以此為獨立尚武的精神所在，而終究完成了偉大的明治維新。並謂日本以冒險的精神完成明治維新，與其說是「知」的工夫，毋寧說是「行」的成功。因此，可以說，陽明學真正教育了日本，成了明治維新思想的原動力。

先總統 蔣公也認為陽明學說對於日本是有影響力的，日本武士道精神，乃是以陽明學為其教育基礎。

中江藤樹曾有答池田子之函曰：

「全集朱學，用工甚久，但覺無入德之門。幸得陽明全集而熟讀之，於是數年之疑惑乃解，而有入德之把柄。」

又告誠門弟子曰：

「全信朱子學，命汝輩專以小學為準則，今始知其為拘泥之甚。蓋守規矩與求名利，原不可同日而語，然其害真性活潑之體則之。」

此中江藤樹談陽明全集後之所言。謂讀書倘專以小學主，為拘泥之形，並從而悟出入德之門。如此論為學之方，可知中江造詣



之深，而受陽明所給予教育思想的影響有多深了。

中江藤樹既歿，百餘年後，有三輪執齋出，是日本陽明學第二期的人物。亦是陽明學中興之祖。年三十三歲，自友人處得陽明傳習錄而讀之，乃捨朱而歸陽明學，作一首詩：

「體爲他人論是非，是非向外我先非，我非焉能使人是，休爲他人論是非。」

心理學上看，這是一種教育的最高理論，莫論是非，一切向由心中求，可以說，是從良知的本體出發的。

第三期近世陽明學，以佐藤一齋爲代表。佐藤生於安永元年，十九歲與林述齋相識，自中井竹山贈以「仆而復實」四字，且告以此爲王文成語，自是嚮而研究王學，在其「言志老至錄」中所言，有與陽明如出一轍者：

「學，一也，而等有三。初學文，次學行，終學心。然初之學文，既在吾心，經之學心，乃學之熟也。有三而無三。教有三等，心教、化也、躬教、迹也、言教則資於言矣，孔子曰：予欲無言，蓋以心教爲尚也。」

佐藤之學，乃勸勉人多重在個人修養上，採用孔子無言之教，不以高深理論爲教條，亦即陽明直指本心之心學，這一點是值得我們注意的。

總括陽明學的教育思想，給予日人的影響如下：

- (一)陽明學簡易直捷，培養出日人快刀利刃的性格。
- (二)陽明學側重「卽知卽行」，使日人有勇往直前的習性，而有以身句道的武士道精神。
- (三)日本人注重事功，陽明社會教育的思想，淺薄易懂，流傳寬廣，使其事功的效果更大。

伍、結論

以上略述陽明教育思想之啟發與流傳。陽明以至敏之文才，至富之閱歷，至深之研究，由博返約，直指本體，以致良知三字爲宗旨，以事上磨鍊爲入學之門，發揮象山心理一致之義，而輔以知行合一之說，孔子所謂「我欲仁，斯仁至矣。」孟子所



言「人皆可以為堯舜者。」得陽明之學而其理愈明矣。

總括陽明一生，正像一部思想史。他遍歷儒、道、墨、佛各家，終於悟透了道，回到儒家，承接了「堯舜之正傳，孔氏之心印」，建立起他個人的思想體系，體其學說上承象山心學，而發皇光大，遠紹孔孟，發揮內聖外王的工夫；在啟後方面，他不僅轉變了理學的頹風，使心學步上高潮，支配了此後四百餘年的思想流變，而更使學說流傳到日本，促使日本維新，揭開日本現代史的序幕。

而陽明之偉大處，尚不僅是建立一種思想體系，且能充分發揮思想體系之指導功能，用之於政，則國泰民安；用之於軍，則向所披靡；用之於教，則春風化雨，故其影響所及，不僅及於明清兩代，今日許多教育、政治、社會問題，亦因其學說之發揚，而獲得新的啟示，尤以今日，我們要振奮士風，從事心理建設，更應該以陽明思想為號召，陽明人格為風範，砥志礪行，以期完成以教育改造社會之重大使命。

參考書舉要

- 王陽明全書 正中書局
明儒學案 黃梨洲 藝文印書館
王陽明知行合一之教 梁起超 中華書局
王陽明之生平及其學說 王禹卿 正中書局
陽明學述要 錢穆 正中書局
陽明學論文集 張其昀等 中華學術院
陽明教育思想 胡美琦 中央文物供應社
比較中日陽明學 張君勱 商務印書館
陽明學 賈豐臻 商務印書館
王陽明哲學 蔡仁原 三民書局
- 中國近三百年學術史 梁啟超 中華書局
宋明理學概述 錢穆 台灣學生書局
宋明理學 吳康 華國出版社
宋明心學評述 甲凱 商務印書館
中國歷代思想家 王熙元 商務印書館
王陽明聖學探討 鄧元忠 正中書局
當代中國哲學 賀麟 台灣時代書局
中國哲學史話 張起鈞 吳怡 自印本
王畿全集 藝文印書館
中國知行學說研究 楊承彬 商務印書館

